

陳少柏教授在深圳辦實驗大學的意義

老百姓

一、陳教授辦實驗大學的經緯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出版的《新聞週刊》報道，陳少柏教授現在深圳籌辦中國實驗大學（China Experimental University），預定一九八六年開始招考學生二五〇名，爾後逐年增加，至一九九八年時將有學生一萬二千名。分設七個學院，其中包括農、法、醫三院。陳教授擬辦實驗大學將來可舉辦某種國際會議，並為西方有意於中國發展企業的企業家們提供特別課程。所以有人說：「這不僅僅是一所大學，簡直是中國現代化的標誌。」

陳教授一九八二年訪問大陸，會見中共首腦鄧小平，陳述他擬辦實驗大學的構想。鄧小平經過研究陳教授的建議以後，給陳教授最高保證，即陳當校長，可以完全控制該校的預算和人事——考選學生，聘請教授，甚至延攬外籍人士擔任校務委員，絕對不會受到中共方面的干預，並在深圳劃撥土地五〇〇英畝作為建校基地，和在六年內補助建校經費一億美元。

二、陳教授辦實驗大學的目的

陳教授的父親是一位四星上將，曾任蔣介石總統的高級助手。陳教授在一九五一年移民美國以前，也在台灣軍中當過上尉，所以陳教授說：「就我的背景而言，我做夢也沒想過要去大陸。」然而今天陳教授去中國大陸，在深圳舉辦中國實驗大學，那麼，陳教授是不是改變了他原有的基本觀念和立場，而接受共產主義投向共產黨呢？

《新聞週刊》報道說：陳教授經美國務院和中共當局保證他在中國大陸的安全和行動自由無問題之後，才接受中共邀請訪問大陸。加之如上文所說，陳教授是在中共保證不干預他的預算人事等校長職權以後才着手籌辦實驗大學。

假如陳教授既經投靠共產黨，就必不費這些周折。換句話說，陳教授仍然是非共產黨人。那麼，陳教授非共產黨人到中共統轄之下的深圳去辦大學，他的目的和動機究竟何在呢？根據《新聞週刊》的報道，可以歸納為下述四點：

1、協助現代化。「現代化」是目前中共當權派的重要政策，陳教授也認為中國應該現代化，與鄧小平有相同的目的，所以他說：「我不是受共產主義的影響，而受影響於鄧小平的作為。我相信中共政府是在正確的軌道上。」

2、介紹西方高級科技（High technology）為「現代化」解決科技落後的問題。實驗大學最初從事電腦科學和工程學的研究，繼之向農學、法學、醫學等方面發展，這些都是中國現代化所急需的科技。

3、介紹西方辦大學的方法。陳教授認為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大學制度非常陳舊、狹隘和效率低微。中國實驗大學採用西方的大學制度，可為大陸上其他大學改進的模範，以教育眾多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

4、消除開放政策上的技術障礙。對西方國家開放，也是中共近年來所採取的重大改革之一，不過中共和西方國家接觸之際，發現若干溝通上的問題；例如彼此觀念、理解、準則、習慣、方法、語言的種種差異，以致彼此接頭辦事來枝節橫生，困難重重，不能完全達到開放政策的預期目的。陳教授想替中共解決這些開放政策上的技術障礙，準備在實驗大學開設特別課程，為有志於中國發展企業的西方企業家們提供學習機會，學得必要智能，解決與其中國對手溝通上的技術問題。此外實驗大學亦將適時舉辦某種國際會議，製造西方與中國的科學家、企業家的接觸機會，增加溝通經驗，互相接洽辦事，順通傳達，使中共的開放政策落實生效。

三、陳教授辦實大的意義

站在純粹愛國的「中國人」的立場上觀察陳教授辦實大一事，中共所蘊蓄的意義是什麼？所謂「中國人」就是無黨無派，也沒有地域及（或）種族歧視的觀念，只想戮力建設中國成為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與世界各國立於平等的國際地位，並改善十億同胞的生活、物質富裕精神愉快。基於這種想法，陳教授辦理實驗大學，似有特殊的意義：

1、中共保證不一定可靠。任何人都知道，中共給陳教授的「保證」是值得懷疑的。例如一九三七年中共宣言：「一、願為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政權，四、改編紅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皇皇正式宣言，中共曾真正實行那項？共產黨的哲學定律是量變質變否定又否定，那能必信必忠？到了某一時機中共改變主意，要求陳教授必須遵照共產黨的意旨辦事，或運用某種手段逼迫陳教授不得不放棄實大校長的職位，都是隨時可發生的。諒陳教授也考慮過這些情況，不過就目前而言，這些只是有可能性，或者說可能性很大，但尚未成為事實，將來是否成為事實？何時成事實？仍是未知數，而中共提供滿意的保證和支助却是現實情況，陳教授在其能够獨立行使校長職權的情況下辦理實驗大學，秉持有利國家民族的工作，做一點算一點的精神是無可厚非的。

2、間接幫忙共產黨。陳教授雖表明態度非投奔共產黨，乃自我貢獻促進國家現代化，但現在是共產黨把持大陸政權，現代化的成果共產黨自然享受，穩固了中共的政權，延長了中共的統治。所以陳教授不啻幫了共產黨大忙。這不無道理，但並非絕對正確。因為陳教授辦大學，作育人才，對於中共政權可以產生有利的結果，也可以造成危害的影響，關鍵在於中共政權能否順應潮流，適當地任用新的人才。若中共從此開始改革，步步前進，由經濟改革進而政治改革，真正建設現代化民主法治制度，那不必諱言，實驗大學培養出來的新秀，一定會對中共政權發生很大的輔助作用。反之，若中共不能繼續改革進步，甚至開倒車，回復以前那樣高壓獨裁，殘民以逞，則實大造就出來的人才，必然是中共倒退政權的有力反抗者。試想一九〇〇年代清廷大辦學校，選派優秀青年出國留學，造就不少人才，大多數成為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志士，就可以知道陳教授辦大學作育人才是一回事，其對中共政權是利是害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一概而論。

3、協助改善老百姓生活。毛澤東自一九四九年建立其全國性的政權以後，搞人民民主專政，鼓動階級鬥爭，實行共產黨專政，用各種極嚴密的組織網

如小組分隊等控制老百姓的身軀活動；用各種極殘酷的思想鬥爭如勞改洗腦等鎮壓老百姓的腦筋思維，使舉國上下所想的只有毛澤東思想，所做的只有毛澤東指派的工作，不能也不敢追求自己有興趣的事情，更不能保有自己勞心勞力所獲得的工作成果如糧食財富等，甚至未經官方准許不能和自己的妻子丈夫或孩子相會。人們分配的口糧很少，不足以充飢；衣服破爛，不足以蔽體；住屋狹隘，不足以容身。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忍受不了這樣精神痛苦物質貧乏的悲慘生活，或自殺自了，或因反抗遭受共幹嚴酷鬥爭而死亡，或冒死逃出大陸脫離魔掌。這樣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劇，在文化大革命時代達到了極峯。

毛澤東一九七六年死亡，接着四人幫垮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當權。他們鑑於國之貧弱，民之困苦，同時也體認到「覆巢之下無完卵」，假如整個國家全體人民都困餓死了，共產黨怎麼樣也逃不了覆巢破卵的滅亡命運，故決心一反過去絕對極權專政的傳統，將各級黨組織的權力壓縮在盡可能小的範圍，給民衆給個體以較大的自由。參照資本主義經濟原理指導經濟改革，並對西方國家開放，吸取歐美日本等國的科技和資金，以加速「四化」建設的腳步。發展農業、工礦業、服務業，增加生產，提高國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改革派實施改革政策以來，中共各級幹部黨員失去了不少往昔的權勢，許多「軍閥之家」「烈屬之家」在自由競爭中成為劣者，在既得利益上又遭受嚴重打擊，許多特權特利被剝奪了，他們自然要起來反抗改革派。

中共既經專政三十五年了，差不多所有共產黨員、幹部都是既得利益者，也都不高興改革派剝奪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故可想象保守派一定不少。他們在共黨內部根深蒂固，盤根錯節，而且長期在政治鬥爭中打滾，養成狡猾奸詐、陰險狠毒的心態和伎倆，可以利用他們在中共黨內組織系統中的原有地位，依照傳統的組織程序，直接有效的威脅改革派的權力地位。

中共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利鬥爭，本不干非共產黨人的事，非共產黨人無妨袖手旁觀，但他們鬥爭的勝敗會影響改革政策的存廢，改革政策的存廢會影響人民生活的好壞。假定保守派鬥垮了改革派，掌握了中共的指揮權，那麼他們必然改變現在改革派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現在人民享有的一點點自由經營產業的權利又會被剝奪掉，說不定又回復到毛澤東時代那樣過着貧困悲慘的生活。非共產黨人爲保持現在既經改善了一些的生活，像陳教授那樣辦學校，作育人才，發展科技，促進現代化，擴大改革效果，直接間接地助長改革派的聲勢，使保守派的反抗起不了什麼作用，不失爲愛護百姓的明智之舉。

4、高瞻遠矚建國之道。現在鄧胡趙改革派一面高呼「四個堅持」，一面大叫「經濟改革」。既堅持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又勵行資本主義型的經濟改革；利用人性的利己本質，獎勵自由競爭，刺激經濟發展，也就是「一國兩制」。共產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目前改革派似乎巧妙地做到矛盾的統一。一面用「四個堅持」為防禦保守派攻擊的護身符，一面以經濟改革的成效緩和人民的憤懣情緒，也用資本主義制度安定香港居民心理，並作對海外華人實施統戰的工具。但這種矛盾統一的局面，究竟能否並存行並至五十年之久？即使達五十年，以後之變化又如何？或共產主義制度獨存而資本主義制度消滅？或資本主義制度獨存而共產主義制度消滅？或由共產、資本兩種主義制度相剋相成，孕育某種主義制度起而取代這兩種制度？這些須視擁護各種主義制度的社會力量消長而定。

孫文學說第六章分析美、法兩國革命結果說：「美國一經革命爾後，……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經濟發達，為世界之冠，而法國一經革命之後，則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兩帝制而三共和，……較之美國，其治亂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說者多稱華盛頓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而拿破倫野心勃勃，有鯨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終帝制。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夫華拿兩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動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為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倫於偏裨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為萬眾心理所造成的「一國之趨勢」、「全國之習尚」，形成氣勢磅礴的社會力量決定國體，是歷史事實證明的真理。』

《中國之春》一九八三年五月總第三期頁四八報道芝加哥中國民主化座談會，座談人員有張鶴飛和周曉青二位大陸學者（張係中國大陸西北工業大學七系副教授，周係鄧陽發動機研究所副研究員，均由中共派往伊里諾里工學院的公費訪問學者），他們兩人強調指出：「1. 民主有階級性；2. 民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3. 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祇有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才能談得上人民享有民主。」又說：「美國也是專政國家，美國的軍隊警察即是行使專政的。」張鶴飛和周曉青都是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說：「民主有階級性」，「人民享有民主」必須對另一部分人民（即所謂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不是對民主的歪曲嗎？他們又說：「美國也是個專

政國家」，可見他們對於民主與專政的認識非常混淆。高級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對民主無知，那一般民衆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甚至有很多文盲，對於民主必更莫名其妙。在大多數人民對民主無知和曲解的情形之下，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戰勝專政的共產主義制度，因「一國之趨勢」「全國之習尚」決定如此，斷非其他力量可以轉移。

那麼，希望建設中國成為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的「中國人」又該怎樣改變習尚，轉移趨勢，使社會環境適於民主政體呢？孫中山先生原擬於「軍政」之後實行「訓政」，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①，補救人民智識程度的不足，及數千年中毒專制的習尚，以防止「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②，立意完善，無奈訓政時期未能切實遵行孫中山先生遺教，完成訓政工作，進入憲政，達到革命建國的目的，且盡棄軍政之功，河山變色，而今大陸人民完全在中共極權專政之下，其所受壓迫的痛苦，超過北洋軍閥時代千萬倍。不管將來是否再有「軍政」時期，像陳教授那樣在現實情況許可下，進入中國大陸辦大學，介紹西方思想，發展科技，啟迪民智，開通風氣，畢竟有助於潛移心理趨勢，默化社會習尚，這也就是深植民權之基的建國途徑。

四、結論

陳教授在深圳興辦實驗大學，研究發展高級科技，從近程看，是響應鄧胡趙改革派，促進現代化，助長經濟繁榮，改善人民生活。從長遠想，是推廣教育，啟迪民智，開通風氣，轉變社會環境，以適於民主制度的落地生根，不失為最踏實的建國途徑。當然，若中共一旦食言失信，背棄保證，使陳教授不能自由行使其校長職權，名為發展高級科技，實則為中共麻醉青年，那甚麼近程遠程的美好希望就都化為泡影了。但他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的務實精神，總比一般徒抱消極態度的人多帶給「中國人」一線希望。因為無論與中共斷絕一切來往，不共戴天；或携家帶眷，離港避難，反共意志十分堅決，但無濟於改善神州人民生活，也遠離了建設中國成為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的途徑。

① 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宣言「其在第八條至十八條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

② 孫文學說第六章「有如此計劃，當然可免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也。」